

见证国民党政府逃台前的金融骗局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许多曾逃往异乡的人携带家眷踏上归途。本文作者与家人搭上一支车队的顺风车，众人对车上密封的木箱颇感好奇。途中，车队遭遇车祸，摔坏的木箱里露出许多崭新的大额钞票。事后，作者才意识到当年的运钞车队其实是国民党政府逃台前骗取民财、私运黄金阴谋的开始。这篇回忆文章将带我们重回历史现场，看清那段特殊时期的金融真相。

中央银行的神秘车队

1933年，我（本文作者，下同）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银行小职员家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我刚4岁，随父母向西逃亡，经南京、武汉、长沙，到重庆后又逃向昆明，于1939年抵达滇西的下关镇。不料，1942年日军在滇西大搞细菌战，我刚满30岁的生母及弟弟陈颖和刚出生的妹妹陈玲先后遇难，只剩下父亲、我和幼弟陈敏。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同当时所有逃难来此的人一样，急于带着残破的家庭回归江南。1945年秋，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总行从重庆回迁上海。于是父亲通过银行界的人脉，让我们父子三人搭上了一支难得的顺风车队。

这支车队的20来辆卡车是

清一色的崭新美制大道奇，另外还有三辆装备机关炮的轮式装甲车保驾。我们在昆明市郊一处窄轨火车站赶上了这支车队。当时每辆车都已经装满长方形的木箱，军士们也已经爬上了车顶，一切都准备妥当。父亲和弟弟坐进了一辆车的驾驶室，而我则坐到车厢顶端去同那个军士相伴。

车队出发后，我坐在高高的车顶，对前面的路况一目了然，那个军士在无聊中同我聊起天来，问：“你知道这些木箱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吗？你老爹告诉你吗？”我当时只对能这样坐上新车而兴奋，又为途中的艰险感到不安，对木箱之类并无多少兴趣。我只好如实回答那军士，我们一家上车前木箱早已装在车上，所以无法知道里面有什么。出乎我意料，他也说他们这一队士兵奉命前来保卫这支车队时，所有的卡车已在火车站外装好货物并排列整齐。

他们这队士兵在上车前得到的唯一指令是，要完全服从车队长官的指挥，全力保护这支车队及其货物安全。他说，这些长官装备精良，有的还拿着美式手提报话机。这时，刚好一辆巡视的装甲车超越了我们前后的几辆卡车。那军士便指了一下说：“看！那领头长官就在装甲车里，卡车队里每隔几辆车也有这样的长官在监督。”

揭开木箱里的秘密

途中，另一支武装车队的一辆开得极快的军用十轮卡车在一处下坡路段翻下了山沟，几个幸存士兵抬着两个或伤或亡的人往公路上爬。看到我们车队开过，那些士兵拼命向我们呼唤招手。我身旁的军士敲打驾驶室顶部，让司机停车救人，没想到司机向军士大喊道：“别敲了，长官严令不准停车。”

因见难不救，我们的车队就同那支武装车队结下了梁子。他们另外的十轮卡车一会儿冲到前面，一会儿又落到后面紧追。两支车队你追我赶，争勇斗狠，险象环生。于是一场车祸又发生了，一辆十轮卡车把我们车队的一辆装甲车撞下了山崖。装甲车四轮朝天，幸而车内的长官安然无恙，其助手也只受了轻伤。

这下事情闹大了。两支车队就地停下，两队的指挥长官们先是高声对骂，进而互相威胁。我们车队长官命令全体军士和司机带上武器下车，占领有利地形，以防万一。我和父亲及幼弟没有武器，只好躲进小山坳里。

谈判从上午谈到傍晚，天色渐暗，还毫无结果。人们渐渐麻木起来，开始扎堆聊天。首先议论的是这车队到底拉的什么宝贝，那些木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货色，人们七嘴八舌，有的说装的是金银，有的说里面有美金外汇，有的说是银行积攒多年的文档，更有人认为大量新印出来的钞票。不管是什么，反正对当局而言是很宝贵的物件，不然怎么会动用装甲车来保卫？至于对方车队装备的是清一色的美制武器，无疑是当局的一支精兵。终于有人听到领队的一位长官说，对方车队之所以如此骄横，是因为他们护送若干中高级军官赶往原沦陷区接收敌产，也是任务紧急。

也许因为我们这方的后台更硬，也许因为在最高当局看来，这些“宝物”比那些人员重要得多。最后对方认怂，双方收兵，对方答应负责把撞落山崖的装甲车拉上来并尽快修好。

第二天下午，对方才把那辆装甲车勉强修好，并且老老实实地让了道，使这列“宝物车队”以更加傲然的姿态顺利通过。令人难料的是，这支车队在贵州境内一条长长的下坡路上，又出了一次车祸。一辆卡车撞到了山崖上，木箱散落一地，有的还摔碎一角，有眼尖者发现摔坏的木箱内装的是崭新的大额钞票。这消息

一下子就在车队内传开了，引起了纷纷的猜测和议论。父亲开口向我们透了点风，说可能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就筹划好的，预先向美、英两国的印钞厂定制了这些新钞，随后由海路运到越南，经滇越铁路送达昆明，再运送到原来的沦陷区。

“宝物车队”一路拖拖拉拉，总算到达贵阳。因前段路上出了些岔子，管制更加严厉，我家三口人也无法再“吃白食”搭车了。再说从贵阳向东，已有多条通路可行，我家就告别了车队，坐上民用汽车，几经周折抵达上海。

“货币改革”背后的逃台阴谋

到上海后，父亲重新进入了银行界。父亲的几位老同事将金融界的一些重大秘密渐渐泄露出来。

早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已半心半意，处心积虑地为战后如何进一步盘剥全国人民做好谋划，并准备了实施办法。那一车崭新的法币，就是专门为原沦陷区的全体老百姓准备的。国民党当局规定，原沦陷区的民众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以200:1的比率将伪币兑换成法币。此令一出，全国震惊，舆论大哗。民众不分阶层，拥有的财富一时间被搜刮殆尽。

此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无所顾忌，大肆增印法币，毫无节制地大放金融洪水，夜以继日地赶印面额越来越大的钞票。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3万亿元。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在1937年，100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而到战后的1947年则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两大捆钞票只能买到一根油条，如要买一袋米，就要用人力车拉上整车钞票去换。

1948年6月，蒋经国向其父报告，说“面临空前危机，有崩溃之可能”，他建议“从速密筹南迁之计划与准备”。于是仅两个月以后，金圆券骗局就开始实施，以尽快将民众的财富搜刮干净，为逃往台湾做经济准备。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发动“货币改革”，宣布废除法币改发金圆券，规定每一元金圆券合纯金0.22217克，其一元合法币300万元。他们严令所有百姓不得私藏黄金、白银、有价证券等，所有持有上述财物的人必须在限期内去银行将上述财物兑换成金圆券，否则将受到严惩。

不久，国民党当局授意将搜刮来的黄金等偷运到台湾。由此可见，金圆券闹剧绝非简单的“货币改革”之类的经济事件，而是国民党政府准备逃台、榨取民财、偷运黄金这“三合一”政治计算的有机组成部分。据《随笔》陈慧/文

